

全球化恰恰体现在城市的变化中

权衡 周振华 萨斯基娅·萨森 吴志强 蒋传海 周其仁

“全球城市”不同于“中心—外围”模型的国际大都市

周振华：感谢前来参加会议的各位专家、老师和同学们，我在这里抛砖引玉，简单谈两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和研究全球城市，甚至把它作为上海城市发展的战略定位？我们如何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

第一个问题可以从世界、国家和地区等多个层面来考量。从世界层面来讲，全球城市这个新范式的塑造主要受到城市化、全球化和技术变革这三股力量的推动。21世纪是城市世纪，已经有5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创造了全球近80%的总产值，到本世纪中叶，城市人口预计可以达到66%，所以城市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体。城市间的高速流动，引发了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城市中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和壮大，必然引发大量的消费需求，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和印度，现在这两个国家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仅占全球比重的5%，但是预计到2050年，将有一半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来自这两个国家。

2018年4月1日，上海人民出版社、格致出版社联合多家单位在上海中心举办“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全球城市理论前沿与上海实践研讨会。主题演讲环节由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权衡主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萨斯基娅·萨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周振华教授、上海财经大学蒋传海教授和同济大学吴志强教授围绕“卓越的全球城市”话题分别作报告。本刊编选部分发言内容，以飨读者。

第二股力量是全球化，国家之间的商品、服务以及投资的流动量，从1990年的5万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30万亿美元，占同期GDP的比重从24%增长到39%，目前出现了新的流动，即跨境数据和信息的流动增长非常迅速，所以城市在全球化背景下同样受到空间压缩的影响，日益成为全球流动量的主要节点。

第三股力量是技术变革，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传统地点空间和新型流动空间的互构，加速资源的全球流动，并且日益凸现出城市作为流动节点的重要性。在这三股力量的交互作用下，城市日益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力合作，并形成了一个世界城市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城市依据全球的网络连通性构成不同的节点，而全球城市就是全球城市

网络中的基本节点，在全球资源的流动和配置当中起战略作用，这与过去基于“中心—外围”模型的国际大都市有着不同的性质和内涵。

这是从世界层面来考虑的，如果从国家层面来讲，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的东移，中国的不断崛起并引领和主导全球化，必然要呼唤新的全球城市的崛起。全球城市作为全球化的产物，作为全球化的空间表达，它必将出现在全球化主流经过的地方，所以全球城市是随着全球化的主要流经路线的改变而动态变化的。

此外，世界经济重心继续东移，亚太地区将涌现出一批全球城市的集群。中国是亚太经济中的一个经济集成国，人民币也日益国际化，近来欧盟也开始使用人民币替代美元。此外，中国也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中国

会逐渐成为全球化的引领者和主导者，所以势必要求有卓越的全球城市在本土崛起，在全球资源流动和配置当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此意义上，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是一个国家战略。

从地方层面来看，上海是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的最优选。首先，上海是上世纪30年代远东经济金融贸易中心，本就具有开放、创新、融合的城市基因。其次，在改革开放40年中，上海已经逐步形成了具有全球主义取向、综合性的全球城市发展的基础，很多学者在研究上海对外连接的时候，就发现上海与欧美发达国家城市之间的连接甚至要超过香港、新加坡，更具有面向全球的倾向，同时也更具有综合性的功能。与此同时，未来30年的上海同样具备进一步发展成为高能级的总部集聚、具有大规模流量的战

略性全球平台的基本条件。比如上海积极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就是促使上海迈向卓越全球城市的基本条件之一。

那么，我们如何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从思想和观念上来说，首先要深刻认识全球城市的内涵，准确把握城市发展的方向。通过规划面向未来30年的上海发展战略，学术界对全球城市的概念、内涵都已经比较清晰，但社会上还存在一些模糊的认识，这些错误的认知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实践和行动产生偏差。

使用“全球城市”来替换“国际大都市”，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替换，而是一个理论范式的变革。城市理论基本模型由“中心—外围”转变成网络节点模型，由中心的地点空间转变为节点，中心与外围的关系是等级的竞争关系、层级关系，而网络节点之间的关系更多是合作关系。

与之相应的是指导思想的变化。过去，我们说上海是长江流域的龙头，带领长三角和长江流域的发展，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现在我们把上海定位于卓越的全球城市，是深耕长三角和长江流域，服务国家战略，面向全球资源战略性配置。除了指导思想的转

(下转5版) →

← (上接3版)

萨森：我在很多年前就做了关于移民的研究，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不单单是叙利亚难民，还有很多其他不同国家的难民。现在是非常不同寻常的难民激增状况。西方模式已经改变了，以前西方有强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在。但现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城市不停地扩张，就像我最近出版的中文书《驱逐》中讨论的，我认真思考了30年，就是在我开始研究全球城市时，我们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难民危机事实上一定程度而言是驱逐危机，“全球南方”(the Global South，或译为“南半球发展中国家”)，即像非洲等地，有很多人被驱逐，失去土地。外国政府和企业的土地征购现象激增，或开发矿产，或种植粮

食，还有可口可乐公司和雀巢公司等占有水资源。实际上都是将当地农民驱逐出他们的土地，这是被遮蔽的历史。这些农民没有权利，没有发声渠道，对于他们来说，直接的应对方式就是进入大城市的贫民窟，最终一部分人变成了移民。所以，其实只是一小部分移民或者难民是因为战争导致的。总之，事实上是这些人都丧失了自己的居住权，相应的，很多土地也已经死了，荒废了。我新书的最后一章《死土，死水》(Dead Land, Dead Water)谈论的就是这方面问题。所以我将新书命名为《驱逐》。除了两种典型的移民类型，即一般移民和难民，如今出现了第三种移民类型，他们是某种模式下经济发展的牺牲者。这被认为是积极的，比如说开发一个大型种植园，

重新安置所有的农民，这看似是经济的增长，然而或许这个种植园40年后也会导致土地荒废。当新移民因大型种植园、采矿业等原因被迫离开土地，这一阶段我们就称为“全球北方”(the Global North，即“北半球发达国家”)。

文汇报：难民危机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逆全球化倾向的加剧，您觉得欧洲未来会往哪个方向走？长远来看，难民危机是否有缓解的可能？

萨森：我真正思考的是政客们的不作为，他们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抱怨：“哦，这是移民和难民的错。”政客们不会说这还关乎其他问题，当然我们讨论的是欧洲和北美的状况。西方的政客或许都懒得去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其中一个真相就是我才说的，造成

难民的原因是他们被驱逐出自己的土地而不得不进入贫民窟。政客们从来不会去做他们要做的“作业”，只是抱怨这是移民们的问题，当然我说的是大部分的政客，也有特别的政治家，比如原哈佛大学法律系伊丽莎白教授，她会关注难民问题的深层原因。现在大部分的政客不懂原因，也不愿意真正思考长远的举措。

文汇报：最后想请您评价一下全球化的走向。近年来似乎逆全球化趋势暗流涌动，给全球化带来不小的冲击。

萨森：全球化已经开始运转，创造了大型的财富活动，创造了富裕群体。当然就像刚才说过的，不是百分之一的巨富而是城市中百分之三十的富裕阶层，这些城市中的富裕阶层将更多中等收入者推出

了城市，提升了房价，对于大量的一般收入的工作者而言，是十分糟糕的情况，他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通勤。与此同时，贪婪、炫耀的风气使得城市变得不那么吸引人。我一直认为城市应该使各式各样不同的人群都能居住，没有哪个城市是一开始就适合所有人的，城市永远是为了不同人群而设计的。然而讽刺的是，现在一些城市觉得自己很好，毫不在意不同群体的受教育问题和多元的城市价值。我们正在失去这些重要内容。财富现在变成了炫耀的资本，而没有流向合理的渠道。以前富人热衷于建造博物馆、图书馆，但现在很多富裕人士似乎更关注自己华丽的别墅和其他浮光掠影。这是与以前截然不同的情况。(采访者为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